

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演变及特点分析

徐建萍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045)

摘要:实践证明,多党合作制度具有整合多元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政党制度之间的关系演变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三大特点,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演变要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相适应,不论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参政的民主党派,都要不断优化和完善自己,充分发挥其在整合多元社会利益的优势。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政党制度;关系演变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3)06-0017-05

政党产生于社会,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的形成也离不开社会,因此,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对政党制度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产生根本性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并最终使二者达到相对平衡。

一、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演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平衡互动(1949年至1956年)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基本的社会阶级构成以五大阶级为主: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地主阶级。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其充足的合法性资源确立了在新中国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不仅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而且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等措施改变了原来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进而改造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被

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和社会基础,形成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基本阶级格局。与这种多元的阶级结构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广泛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起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初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民主党派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参国政、长期合作的党派关系”^[1]。

当然,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民主党派是否还要存在的问题是有过争论的。民主党派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共产党中一些同志也认为,民主党派完成了争取民主的任务,可以取消了。还有些同志认为,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批评了这些认识,他在1950年2月明确表示民主党派不能

收稿日期:2013-09-20

作者简介:徐建萍(1976-)女,山东莱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主要从事统一战线、政党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解散,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要继续发展。之后,毛泽东还指出,民主党派是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背后的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2]。

1953年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开始以及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后,一方面,城市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逐渐退出经济领域,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削弱;另一方面,人民政协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终止,成为党派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政党制度的重要机构,民主党派完成了向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与监督的角色转变。不过,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总体上在预定范围内调整,并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从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当时多元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相互适应的,二者基本保持着平衡互动,巩固了新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了这一政党制度的优势,领导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广泛参与国家政权,整合了复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至改革开放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被动平衡(1957年至1978年)

1956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生产关系的变革及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全面改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城乡小资产阶级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农民阶级通过合作化运动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依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这样,中国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全新的简单的阶级阶层结构。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党派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针对这一问题的争论,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3]³⁴这时,毛泽东提出在“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的新中国政党制度的具体设想。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研究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再次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指出“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

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取不同的声音”^[3]²³⁵。党的八大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4]这样,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代表的各民主党派,转化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成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型政党。也就是说,尽管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失了,但这个阶级的成员特别是政治代表人物,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力量和传统的政治力量无疑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民主党派仍以传统的社会力量作为群众基础和工作对象,我国的政党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巩固和发展,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调整。

不过,不久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相继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以及国内连续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合作)社等事件,使共产党自战争年代就形成的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随着中苏关系破裂、国际上几股势力联合反华,党内高层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错误估量,阶级斗争逐渐扩大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最终被认定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毛泽东等高层对民主党派性质的判断有了改变,1957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民主党派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8月29日的社论又重申:“各民主党派在总的方面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还没有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5]这一性质认定对各民主党派打击巨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在实际上由“互相监督”变成为执政党(前者)对参政党(后者)的单向监督^[6]。民主党派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学习和改造,参政平台——政协活动减少,其参政与监督功能受到极大限制。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调整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曾得到改善,但60年代中期形成了“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民主党派的能动作用重新退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受到全面破坏,人民政协也基本停止活动,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共存与监督的角色基本缺失。

这一阶段,政治因素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选择直接决定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

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定性,一方面,使民主党派丧失了其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另一方面,也使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得到强化,导致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实际上形成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的被动平衡。这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非常态化,带来了政党关系的非制度化,导致了政党与社会的失衡,整个中国因此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

(三)改革开放至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间的关系再度走向平衡互动(1978年至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路线,将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封闭自守转向全面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分化、重组和调整。原有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体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分化为若干阶层,并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逐渐走向多元化。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一方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多元使社会利益多元化,如何把各种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在现有政治体制下整合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满足不同利益需求成为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重大政治问题;另一方面,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多元化也使得各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发生明显变化,如何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扩大自己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成为各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改革开放伊始,就从政治体制的高度进行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的探索。不但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而且在宪法中肯定了爱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依靠体制内长期存在的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来整合不同阶级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化利益需求,成为执政党的优先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总协调者。民主党派则代表一些特定社会阶层的特殊的具

体的利益,“各民主党派成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负有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他们所联系的各部分群众的具体利益与要求的责任”^{[7]145}。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政党制度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提高其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使其逐渐成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度优势得到更大的发挥。同时,为了更好地整合各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向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开放”,以便进一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在新的社会阶层特别是私人企业主中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而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也适应变化,重新定位自己的群众基础、工作对象和党员来源,更好地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作用,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这种适时调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发展,为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合理化成长提供了空间。

总体来看,经济因素成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过去以国家强制力介入阶级阶层整合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执政党能够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而作出适时的政策调整,保持政党的活力,从而使政党制度逐步优化。实践证明,多党合作制度具有整合多元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优势,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政党制度间的关系再度实现了平衡互动。

二、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关系演变的特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主导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政党制度间关系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成为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7]536}。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与道德、路线法理与制度、组织体系以及领袖个人魅力等方面的系统建构,确立了自身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与执政地位^[8]。经过“全面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国共产党将过渡时期有限的领导地位逐渐“全能化”,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了顶峰。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9],转变全能化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

简直毫无意义”^[10]。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政策调整,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和主导政党制度演变,在某些特定阶段,甚至决定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共产党按照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短时间内用行政手段变革生产关系,完成对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改造,消灭了民主党派存在的阶级基础,强化其一元化的核心领导地位,使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革,带来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也适时扩大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同时确立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推进政党制度的合理化演变,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阶级阶层结构变化。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阶级阶层状况的判断直接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每一次政党制度的重大变化或微小调整,无不源于中国共产党对阶级阶层状况的分析及政策制定和实施。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阶级阶层分析客观时,民主党派的性质和地位界定会比较准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之间便会保持着自然的平衡。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客观地分析了当时五大阶级的社会结构,民主党派得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团结协作”的挚友、诤友,进而确立了与多元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路线的调整,执政党对我国阶级阶层结构的认识走向客观,对新时期民主党派的性质、地位、作用有了全新的认定,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不断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而作出调整,从而使二者的关系逐渐达到自然的平衡。相反,当中国共产党对阶级阶层状况分析失去客观标准时,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就会被削弱,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也会遭到削弱甚至名存实亡。

(二)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间的关系演变呈现明显的阶段性

政党及政党制度与现代化发展相互关联。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属“先发内生型”,政党是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分化的必然结果,政党制度与社会阶层结构间的关系一般而言保持着自然的互动。对于“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党最初的出现是在外来的影响和压力下,为了维护其生存和发展整合政治资源的现实需要。因此,在后发型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共产党来发挥其导向和组织功能,这就奠定了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受意识形态和工作重点转移等多种因素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多次进行重大调整,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和政党制度的调整,也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上面论述的明显不同的三个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形成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民主党派作用消失息尽的名存实亡的多党合作制度,只是对“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社会结构的被动回应。这与西方国家两者之间社会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间一以贯之的自然互动关系是不同的。

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多元化趋势的加强,面临着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冲突加剧的挑战,执政党不得进行政策收缩和调适,充分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将不同的利益要求纳入制度化轨道,具有结构优势的政党制度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继将民主党派确定为参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写入宪法以及政党制度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后,执政党进一步提出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民主党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新阶段,通过意识形态和行政手段大规模改变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情况已经不可能重现了,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间的关系走向自然的平衡互动。

(三)当代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间的关系有着必然的相关性

政党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后,同一阶级阶层或利益相近的阶级阶层在追求利益过程中形成的。一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根据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状而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会直接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影响到政党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客观上要求政党适应这一变迁而适时转型,巩固和扩大自身的社会阶级阶层基础,保持政党的生机和活力,进而影响到政党制度的发展变化。

在当代中国,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必然联系,只不过呈现了独特的中国烙印,既存在着被动回应的阶段,也有主动适应、自然平衡的阶段。继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多元化而建立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后,社会主义改造后形成了“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导致了民主党派

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消失,强化了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多党合作制度名存实亡。但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社会多元化趋势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适应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同时发挥民主党派在整合社会力量的巨大优势,不断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政党制度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中国的实践说明,不论是共产党主导的骤风急雨式的社会变革,还是随着现代化推进而发生的潜移默化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革,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党制度都会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调整,并最终达到二者之间的平衡。

三、当代中国阶级阶层结构与政党制度之间互动关系的启示

(一)执政党必须适应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来优化政党制度

第一,执政党应该致力于构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使原有的利益格局重新配置,导致各种矛盾不断激化,这给执政党提出了挑战。执政党应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制定合理的社会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培育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进而巩固和扩大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第二,执政党要通过开发合法性资源,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吸收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党组织,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水平,努力构建系统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机制,更好地凝聚社会各种力量,发挥党在社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三,中国共产党要科学配置政治资源,优化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一方面,要保证民主党派依法行使参政权,加强党派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使政党制度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另一方面,要鼓励参政党提出鲜明的反映各自所联系群众与界别利益特点的政治纲领和参政理念,并充分代表其所联系群众的利益参政议政,充分保证政党制度利益整合功能的发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真正实现社

会的长治久安。

(二)参政党理应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多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第一,协商民主是适应社会阶层结构变动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主形式,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主体,参政党应该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推进建设性的协商对话,协助执政党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第二,民主党派要不断扩大社会基础。要在新的社会阶层中合理有序地扩大队伍,把自己的传统界别优势与现实的社会结构结合起来定位自己的群众基础和工作对象,拓宽工作范围,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民主党派要加强同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沟通、交流和协调。既要维护他们的利益,成为实现其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平台,又要合理利用资源,做好所联系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工作,带动自己所联系的群众成为爱国敬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扩大自身影响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庞松,王东. 潜轨与嬗变——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备忘录[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52.
- [2]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6.
-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刘少奇选集(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46.
- [5] 社论. 各民主党派的严重任务[N]. 人民日报,1957-08-29.
- [6] 郑谦,等.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103.
- [7]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8] 王智. 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变迁——以执政党为中心的政党—政府—社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8.
- [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21.
- [10]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14卷序.

责任编辑:王 珊